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論文文獻回顧部分，在第一節的部分將探討本研究所涉及到的相關理論，包括語言學的理论、全球化論述、後殖民論述、後結構主義以及成人學習理論；在第二節的部分則將與本研究相關的期刊與論文的研究內容進行分析。與本論文相關理論的探討部分包括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全球化論述、後殖民論述、文化霸權、後結構主義以及適應理論的社會教育思潮，以下將一一說明這些相關的理论思想。

第一節 後殖民論述

在本節當中，將針對後殖民論述中幾個主要的學者的理論，如做一深入的探討，這些學者包括甘地(M. K. Gandhi, 1969 - 1948)¹、法農(Franz Fanon, 1925 - 1961)、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 -)、史畢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 -)等。另外在本節中，也將對後殖民從殖民到後殖民歷史與意義上的轉換做完整的介紹，以此作為往後論述分析的基礎。

壹、殖民主義與後殖民論述的關係

後殖民(postcolonial)這個字是相當複雜的概念，它涵蓋、綜合了許多學問的形成的一個概念。從語義學上來說，是可以將它化約地、單一地說是在殖民主義(colonialism)之後的，但是從殖民主義之後的說法上，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其間相關的脈絡中又出現斷裂以及歪曲的現象。因此如王岳川(2001: 1)所說，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聖雄甘地將自己在南非時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運用到印度的民主奮鬥中。

discourse)²是一種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評方法的集合性話語。主要是研究殖民時期之「後」，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係，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文化、文化權力身份等新問題。

從殖民主義到新殖民或後殖民論述的出現，並不意謂殖民主義的消失，殖民主義並未隨著西方列強在地理空間上的殖民事業的結束而中止。因此後殖民主義並非從本世紀中突然出現，而是在對殖民主義的長期反省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本世紀初，大批理論家就已經開始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分析和批判。如果說，殖民主義主要是對經濟、政治、軍事和國家主權上進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話，那麼，後殖民主義則是要強調文化、知識、語言和文化霸權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而獲得自身的獨立和發展，成為後殖民理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此後殖民主義又稱為「文化殖民主義」(cultural colonialism)。然而，雖然後殖民要處理的是如此積極的、正面的、確切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其全部的焦點就是集中在破壞殖民的意識型態以及其影響力，其意義並不是在破壞殖民的意識型態中所建立的，而是指要從這些影響力或意識型態中轉移出來。因為這些影響力或意識型態是一種有意識地依著一特定路線佈置好的，且是深植於歷史與特定空間中的。也就是說，當代非洲的各方面的文化生活常常是權力上的一直是受到非洲社會從殖民主義過渡或轉變過程中影響的(Appiah,1995；Giopson,1997；陶東風，2000；王岳川，2001)。

² 王岳川在其《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一書中將後殖民論述稱之為 postcolonial theory，筆者認為後殖民同全球化一樣在當代只能稱之為一種論述，尚不能成為理論，故用 postcolonial discourse 代替。

貳、後殖民論述興起的時間及代表學者

後殖民興起的時間，學界常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認為在 19 世紀後半就已蒙發，而在 1947 年印度獨立後始出現一種新意識和新理論。後殖民雖是研究殖民之後，在時間上並不意謂殖民主義結束即開展了後殖民主義的到來，殖民主義並不是隨著物理與軍事意義上的殖民佔領的結束而結束，對於殖民主義的心理抵抗在殖民統治行為一開始的時候就存在了。因此對於後殖民批評家來說，是有必要先認識存在並活躍於殖民過去的反抗動力，亦即先瞭解反抗的歷史。在後殖民批評家甘地(M. K. Gandhi, 1969 - 1948)³ 與法農(Franz Fanon, 1925 - 1961)⁴這樣的歷史人物身上，可以找到最初建構後殖民論述的嘗試。一般認為後殖民意識的自覺和成熟是以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 -)的《東方主義》(1978)出版為標誌。在薩依德之後，最重要的理論家有史畢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42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等。史畢瓦克為印度人，1942 年出生於加爾各答(Calcutta)。她將女權主義理論、阿圖塞理論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整合在自己的後殖民的理論中，從而成為一位有廣泛影響的批評家。而霍米·巴巴則張揚第三世界文化理論，至重符號學與文化學層面的後殖民批評，並將自己的研究從非洲文學轉到印度次大陸上來(陶東風，2000；王岳川，2001: 10；Rothermund, 2000)。

在這一層面，本世紀初的兩位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和法農的「民族文化」理論，對後殖民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米

³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聖雄甘地將自己在南非時形成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運用到印度的民主奮鬥中。

⁵ 法農為後殖民批評家，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核心人物。

歇·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的「話語」理論和「權力」理論，則成為後殖民主義思潮中的核心話題，對於文化霸權的部分，在本節的第五部分將再做詳細的介紹。

後殖民概念的發展是依賴於許多思想家的不斷思索而起的，因此，對於後殖民的理解，必須先從為後殖民紮根的思想家著手，首先從薩依德的思想開始著手，而後加以探討其他相關的思想家，以掌握後殖民此概念。

(一)薩依德的後殖民思想

薩依德是世界著名的文學兼文化批評家。薩依德為巴勒斯坦人，1935年生於耶路撒冷，少年歲月大多在開羅與黎巴嫩度過的，小時候是在開羅求學的，隨後同父母移居至黎巴嫩，並且曾在歐洲國家流浪，直至1951年到美國，並且於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來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為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另外薩依德也是著名的樂評家、歌劇學者、鋼琴家(Said,1999)。

在介紹薩依德的後殖民思想之前，可以從薩依德的個人傳記《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 1999)中，瞭解到其實其早期的生活歷程可以說並不順遂，時時是處於逆境，但也正因為這種艱困的環境，反而使得薩依德親身體認到各種格格不入的多重身份以及同歷史的交錯，諸如以阿拉伯人的身份而為基督徒，身為巴勒斯坦人卻持美國護照，自始即自覺為「局外人」，加上始終拿不定自己的第一語究竟是屬阿拉伯語抑或英語，以及阿拉伯姓上架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英國名字，在在都令他無論置身何處，都有格格不入之感。然而這使得薩依德可以以東方人的視野看待西方的文化，尤其是美國的文化，也就是說他是以前邊緣的話語去面對西方這個中心權力話語，也更能夠以切身的流亡處境看待後殖民文化的境遇(王岳川，2001；Said, 1999)。

接著，從薩依德的成名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這本書，可以認識到薩依德對於後殖民思想的態度。這本《東方主義》的書名”Orientalism”一詞，它是有相當具體的指涉，並不能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為主張東方中心、倡導東方價值觀的一種主義。這個詞指的是一套論述，是在一個不平等的不同權力之間的交流過程中產生然後存在的，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受到政治性權力、文化性權力、知識性權力、道德性權力的影響所形成的。因此，它所代表的意思不僅僅是西方對東方在學術上是帶有傾向的研究，同時也包括了西方在客觀世界、政治和社會生活、文學作品中對東方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以薩依德為代表的後殖民研究，所研究的不是從歷史上求證東方主義的觀點是否適用於東方，也不是對東方本身的研究，而是專門研究作為一種觀念的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基於對「東方」與「西方」的區別之上的一種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思維方式，它也是一種西方統治、重新建構和支配東方的話語，在東西方之間勢力懸殊的情形下，若進行關於東方的話語交流往往是更容易淪為再次印證文化霸權的存在。實際上，薩依德筆下的東方主義代表着西方人的東方觀，東方是西方所建構出來的。但東西方這兩個地理學上的實體是相互依存、相互反映的，東方成為了一個沒有話語權的「他者」。它至少包含了以下的幾個方面(張京媛，1995；陶東風，2000；王岳川，2001；陳燕谷，2001)：

- (1)東西方是二元對立的，而且採取西方優秀，東方低劣的模式：西方與東方絕對存在著差異性，西方永遠是理性、優秀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東方則是不理性的、劣等的。
- (2)東方是西方的建構物：基於東西方的差異性，西方的學者和作家建構出東方的形象，以便於西方對東方進行控制的工作。

(二) 霍米·巴巴的後殖民思想

霍米·巴巴是在印度成長的波斯人後裔，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英語系客座教授、以及英國色薩斯大學英文系教授，主編《國族與敘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另有一論文集《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在學術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霍米·巴巴自身的文化身份，與薩依德是很相似的，其文化身份也是處於相當尷尬的情況，他既不是印度人，但是卻成長在對西方人仰其鼻息的印度，並且得以躋身於中產階級之列，同時又做為一般印度人所看不起波斯人。在這種複雜的文化、階級和經濟的身份，使他很難定位出自己的文化地位，無法將自己整合為一個單純且統一的個體，時時處在自我身份認同的懷疑之中。如同薩依德一般，這種複雜的身份構成了霍米·巴巴對文化殖民、文化霸權質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前提。

從霍米·巴巴《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一書可以清楚看出其在身份認同混亂下，深刻體認到文化殖民的問題。該書提到，座落在不同文化中，僅僅只是一種令人恐懼的東西，是在一種可怕的、有訓練的對抗、鬥爭中，在沒有空間或權力之中，一種令人感到害怕的幽靈(phantom)，然而遏制的、牽制的策略才是更令人恐懼的。也就是說，西方不斷生產的以「他者」(The Other)的概念述說的文本(text)永遠是一直在解釋著差異的內容，絕對不會是一種主動的連結差異的機制(Bhabha, 1994: 31)。

另外霍米·巴巴在《後殖民與後現代》一文中指出，後殖民批評旨在揭露以下三種「社會病理」(張寬，2001)。

1. 在爭奪現代世界的政治權威與社會權威的鬥爭中，文化表象之間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力量對比關係；

2.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話語是如何為不同的（常常是弱勢的）國家，種族和民族設定一個霸權主義「規範」的；

3.揭露現代性的「理性化」過程是如何掩蓋和壓抑其內在的矛盾與衝突的。

因此，在他看來，所有這些社會病理現象都「再也不能捆綁在階級對抗這個軸上，而是爆裂為無數歷史偶然性的碎片」。

參、後殖民的基本內涵

關於「後殖民」的定義，《美國傳統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解釋後殖民為一個殖民地脫離殖民國獨立之後的時期或者是與獨立之後有相關聯的事物。另外從汪暉、陳燕谷主編之《文化與公共性》一書中，對於後殖民此概念做一基本詮釋(1998: 446)⁵：

「後殖民」一詞的意義有三種用法是特別是特別突出(和重要)的：(1)描述前殖民地社會的狀況，在這種情況它有著具體明確的指稱對象，如後殖民社會或後殖民知識份子；(2)描述殖民主義時代以後的全球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它的用法比較抽象，缺乏具體的所指，同它企圖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樣，意義模糊不清；(3)描述一種關於上述全球狀態的話語，這種話語的認識論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狀態的產物。

一般來說，「後殖民」研究的目標是雙重的：在當代全球關係轉化的語境中考察「後殖民」這個術語，以及與之關連的各種思想和文化立場；考察全球關係關係轉化所要求對於統治和霸權問題以及被普遍接受的批評實踐的重新思考。

現在被稱為後殖民批評的那些主題，無論是它們對過去否定還

⁵ 本段引自汪暉、陳燕谷編著的《文化與公共性》一書。

是對現在的肯定，都和一些在世界新形勢下產生的問題與取向息息相關，在過去的十年裡後者也成為全球意識的一部份。我在這裡所指的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所造成的世界形勢，也就是所謂的全球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出現所造成的世界形勢。這些新術語瓦解了以往用來表述全球關係的那些概念，尤其是用殖民統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與其他地區這些二元對立所表示的關係，在所有這些關係中，民族國家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普遍的政治組織單位。問題不在於通過反思後殖民批評家的能力來揭示，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批評取向所獲得的社會地位依賴於這種世界新形勢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政治及文化問題對於概念的需要。需要反思的是，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後殖民批評家在後殖民主義觀念與當代資本主義語境的關係問題上保持沈默的那種後殖民主義意識型態；的確，由於否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中的基礎性作用，他們就抑制了考察這種可能的關係的必要性(Ibid.: 445)。

殖民觀念在文化批評中所佔據的優勢地位同 80 年代以來發生的全球資本主義意識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係；其次，後殖民批評的主題與這些關係轉化所提出的對於觀念的需要密切相關，所有這些關係的轉化都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變化而引起的。後殖民與霸權的共謀關係在於，後殖民主義轉移了對當代政治、社會及文化統治形式的關注，並且模糊了它自身與其發生條件即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不論在現象上顯得多麼支離破碎，這種全球資本主義依然是全球關係的結構原則。

因此，總的來說，後殖民的最終目標在於實現文化總體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不外乎以下兩種：把中心地帶的歐美文化批評的那些問題和思想取向擴展到全球範圍；把以往處於政治的和意識型態殖民主

義邊緣的聲音和主體性引進到歐美文化批評中來。因此，後殖民的宗旨無非是取消中心和邊緣的差別，以及所有那些被認為是殖民(主義)思維方式之遺產的二元主義(殖民統治者/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與其他地區)。並且，後殖民的訴求似乎是超越國家、地區乃至政治界限的，這至少在表面上證實了它所宣稱的全球性。

肆、後殖民的模仿理論

從殖民到後殖民論述過程的轉變，其特色我們可以試圖從霍米·巴巴的模仿理論(colonial theory)，來加以分析說明。霍米·巴巴使用殖民擬態(colonial mimicry)來說明被殖民者某些的特徵與殖民者的生活環境是相當相似，並據此來解釋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現象。也就是說，被殖民者會試圖模仿殖民者，並且模仿的過程是經過「一種否定的過程」(a process of disavowal)，企圖再現出一種不同於殖民者的模式。在這模仿的過程中，被殖民者既受到殖民者文化的影響，但又由於歷史、文化、種族上的差異使其否定其所受到影響的文化特徵，並因而努力強調、張揚自己文化的特徵。因此，在這又愛又恨的態度纏繞下，被殖民者所發展的文化模式呈現出一種混合的特徵，也就是說，被殖民者只再現出殖民者的部分樣態，此再現出來的模式與殖民者的不盡相似。

法農在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⁶中，從黑人不斷地透過各種方式，努力成為白人所具有的各種生理、心理與社會特徵，來說明了黑人(被殖民者)的自我主體性如何受到白人(殖民者)的壓制。法農指出，這些由黑漂白的過程中，便是顯示了黑人已經接受白人對黑人的

⁶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2.

歧視態度，且正因為黑人認同自己是次於白人的或者黑人不是人等說法，因此他們不惜一切代價試圖透過學習白人的生活方式、語言表達方式、掌握白人的身體等等的方式，在外觀上甚至內在態度各方面，在在都顯示出白人的特徵，也由此向白人證明他們是有價值的。令人覺得可悲的是，這種由黑漂白的過程中，黑人自我的認同是建立在白人的認可之上。白人透過經濟上的強勢，建構黑人的自我主體性，形成一種他者的意象，讓黑人確切地認同自己是低一等的種族，如果要獲得跟白人一樣的身份與地位，則必須不斷地透過模仿白人那一套的生活方式、使用的語言等等的手段，來認同白人的文化，並貶低自己的文化傳統。

這也就是說，被殖民者即使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然而在殖民的過程中，深深地接受殖民者所傳遞的價值文化，並與自身的文化相結合，試圖創造一個不同於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價值，但結果往往不是這樣的美滿。

在分析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論述時，有人視之為「派生的論述」(derivative discourse)，也有人批評第三世界國家是「繼承者國家」(inheritor states)，繼承了殖民者的行政管理結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跟殖民者的計畫與意象相對抗的論述，國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又反過來，傾向於再生產與敵人相一致的邏輯：面對總體的權力結構，在周旋中進行自我調整時，所找到的安身位置卻仍是此一權力結構中的位置。這裡所說的是指導本土化的邏輯，它在模仿的過程中，可能走向把差異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 of difference)的路—其根據的邏輯，與殖民者的種族主義並無分別，只是「他者」變成了我，價值互相倒轉。

我們將後殖民論述落實到現代民族主義的發展上，一個真正的、屬於本土的民族主義可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已經不像已往只是要求一

種在領土範圍上、在地域上和其他民族相區隔。當代民族主義的實現更重要的是擺脫佔統治地位的支配語言，因為語言是思想體系建立的起源，是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是人們一切活動之所以可能的後盾，所以要求得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就必須在語言上徹底排除統治語言的支配和壓迫。後殖民狀態，後殖民是對語言—統治意象的批判，後殖民學者是採取一個語言分析的立場，對殖民統治意象的批判，常集中在文學和語言的角色上，因為西方對外的殖民往往去除掉武力的殖民手段之後，剩餘的也是最核心的部份乃是語言的殖民與統治。我們可以從西方世界具有文本的權威性，西方的書寫文字比非西方的書寫文字以及口語具有權威便可清楚理解。

基本上，帝國主義年代已經讓位給全球化年代。帝國主義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的，而全球化則缺乏一個中心，缺乏一個單一的負責調控的指揮。不同的故事便以此為背景一一展開：僑居異國的故事、品種混合的故事、全球化下的混雜故事—各自標榜著不同的領域。

既然「解殖」並不以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為結局，那它的未來是什麼呢？多元中心主義的關係概念在這裡被提出了，但必須注意的是這種說法(多元中心主義)，卻可能仍是中心主義的邏輯。

基本上如果解殖的論述仍然停留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中(西方—東方、白人—黑人)，將難有出路。但如果將「混雜性」(hybridization)作為一個主要的觀點和主題，至少可以提供一個不同力量相互推擠和碰撞的空間。也就是說，對於未來將會過渡到一個融合的終極狀態視為最後的結局，而應把各種文化視為是本身自有意義的(不是和他人比較後才有意義)，一種複雜的多元身份的狀況。因此伴隨著混雜化而來的是這樣一個狀況：沒有一個意象的中心，也沒有一個文化的中心，更沒有比較和區隔，在這個狀況下所被強調的只是自身文化的意

義。

伍、文化霸權

「文化霸權」(Hegemony)是義大利的馬克斯主義者，葛蘭西，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理論思想。葛蘭西，是薩丁尼亞人，是本世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從杜林大學輟學之後，1916年他就成為義大利社會黨(Italian Socialist Party, 簡稱 PSI)的活躍份子與新聞記者。在義大利1919到1920紅色的兩年(biennio rosso)期間一段極度動盪不安的時期他支持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uncils)運動。並在一份與人合編，名為《新秩序》(L' Ordine Nuovo)的刊物上，發展出他的工廠委員會理論；他認為，工廠委員會的網絡組合是革命性變遷的主要執行者(agency)，並且也是未來社會的雛形結構。然而，法西斯主義(Fascism)興起之後，葛蘭西便拋棄了此一理論此一理論曾被那些更為正統的伙伴們碎即為「工團主義」(syndicalist)並且將其注意力轉移到政黨之統合性與教育性的角色這一問題上。1921年，他與左翼不滿份子的同道們自 PSI 脫離出來，另組義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並為此新成立的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而他自1924年，由莫斯科訪問歸來，便開始領導該組織，直到1926年為墨索里尼政權拘捕下獄為止(Bocock, 1991)⁷。

往後葛蘭西都是在獄中度過餘生，而在這段時期，葛蘭西寫下了《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這是一部龐大、散亂無章且未完成的著作，但卻仍然是當代的一部經典。《獄中札記》乃是將他早期在報紙上的文章中未釐清的觀念加以精鍊，進而提出了一種人本主義觀的馬克思主義(a humanist conception of Marxism)，強調人的主體性

⁷ 本段主要引自波寇克(1991)以及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

(subjectivity)即信仰、價值、熱望與理論。由於受到克羅齊(Croce)式觀念論哲學的影響，且對正統派缺乏好感，葛蘭西向下列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質素提出質疑：1.認為實在(reality)除了物質(matter)之外一無所有的化約性物質論(reductive physicalism)；2.對於知識所採取之被動性的(passive)、或冥想性的(contemplative)觀念；3.想要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擴充到對人之研究上的企圖；4.認為歷史遵守著類似於物理科學的普遍因果法則之此種信念；5.認為文化與政治活動只是經濟實踐的蒼白反映而已，於是將之予以忽略；6.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乃是藉由壓迫而勉強結合的衝突負載系統(conflict-ridden system)此一預設；以及，7.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崩潰乃由其內在矛盾而獲確證的此種樂觀信念。就葛蘭西的看法，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災難性地將一種形而上的，或者超驗的(transcendent)圖樣(design)強加在歷史之上，而此種圖樣乃是獨立於人的意志與行動之外儘管在這其中之「隱藏之上帝」(hidden God)不再是黑格爾所說的「精神」(Spirit)，但卻是一個同等抽象非人化的「自然」(Nature) (Bocock, 1991)⁸。

葛蘭西最為人熟知的是「文化霸權」(hegemony)或說道德／精神的霸權(moral/spiritual supremacy)的學說；依據此一學說，一個階級或團體的支配權(ascendancy)主要是繫於將其世界觀轉化成一具普遍性與支配地位的思潮(ethos)，以指引日常生活模式之能力。依據他的看法，由於布爾喬亞文化霸權之故，馬克思主義應採取一種非布爾什維克式(non-Bolshevik)的策略；在此策略下，一個革命政黨在取得權力之前，必須先完成大眾的精神改造(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sses)。因此重點遂從政治革命轉移到文化革命，也就是掃除「時代的殘渣」(the muck of ages)此一長期的工作。正如葛蘭西本人所了

database/Gramsci_Antonio.html 網路資料

解的，這種耐心的、漸進式的方法與列寧主義者對政黨所持的觀念是不相容的，因後者將政黨視為統一的、準軍事性的(quasi-military)的結構，而與人們日常事務脫節。他的馬克思主義因強調說服(persuasion)、文化與大眾參與，遂啟發了「歐洲共產主義者」與莫斯科劃清界限，然而，儘管他所倡導的是一種「多數者」而非「少數者」革命，葛蘭西本人始終仍是一位身體力行的革命家(Bocock, 1991)⁹。霸權的概念用到文化研究上，是一種試圖表明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表象以及活動是經過精心設計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文化被西方用來對非西方實施霸權的手段，同時西方國家透過全球化過程所施行的文化霸權並非是用武力推行的，反而是透過生活的權威和文化方面的事實來表現。因此研究文化霸權時，首先要分析的便是「機制」(institutions)，這些機制生產大量知識、感覺與意義，其作為文化載體的重要性不僅是其本身所標榜的功能，另外也體現在它們作為個人和社會意識的組織者和生產者的身分上面。一般認為機制是中性的，並不會偏向某種階級或族群的，例如國家、法律、教育制度、傳播媒介與家庭等都是機制的種類(陸揚、王毅，2000；Dirlik, 1999)。本研究要探討的是這些為成人設計的、具有傳播媒介作用所設計編纂的教材內容中，是不是含有屈從於某個統治階級的權力壓迫的形式下而不自知，也就是說本研究擬從教材的文字去分析出文字是否具有人們被同化到統一的世界觀或者說霸權中而不自覺的意涵存在，透過教材內容的分析，揭露種種的「不平等」予以合法化的過程。然而文化霸權的概念同全球化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分析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時，是以全球性的概念涵蓋文化霸權的。

總結本節的內容，後殖民論述是從殖民主義發展出來的，是被殖

⁸ 同註 7

民者(the colonized)反抗殖民者(colonizer)的殖民統治，這種殖民統治在舊殖民時期指的是軍事上、政治上的侵略；而在後殖民時期則為文化、語言上的干涉。然而後殖民論述不同於殖民主義在於後者的目的是要解除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控制，要獲得的是國家的主權，前者則並不是要移除甚至破壞殖民的意識型態及影響力，而是希望與做為中心的殖民的意識型態相對立而另外區分出一種立場。本論文即透過後殖民為此目的做出的種種論述中，如探討殖民主體的問題、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批判以及重視「文化認同」的問題等議題，來分析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內容是不是涵蓋了後殖民所批判的意識在內。本研究即試圖以後殖民的幾個中心概念，如「在地性」(glocalization)¹⁰、「他者性」(otherness)¹¹、反抗性(resistance)¹²作為分析的基礎，來檢視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當中所隱含的後殖民性。

⁹ 同註 7

¹⁰ 在地性指的是所有全球範圍的思想和產品都必須適應當地環境的方式。此定義引自於《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頁 3。

¹¹ 「他者」在後殖民論述中是一項重要的概念，他者具有雙重性，同時包含認同與差異；他者也隱含西方對東方的概念。

¹² 反抗性是後殖民論述時圍繞的一種核心概念，後殖民強調的就是反抗以西方為主體建構非西方的不合理壓迫行動。

第二節 全球化論述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問題自 1980 年代以來就引起相當熱烈的探討，尤其在經濟學家、政治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合作下更將全球化研究推向了高峰。近幾年來，隨著整個世界不斷地進行全球化的工作，相運而生的，出現了許多與全球化相關的議題。其中，例如全球化的危機、文化霸權、後殖民 (post-colonialization) 等名詞的出現，更加顯現出全球化的發展已經逐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全球化的運作已經不再只是侷限於經濟活動的交換和溝通上，全球化這個現象本身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全球化再度成為各個領域的學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全球化的假說是各個民族國家經濟之間的關係的性質近年來發生了一種迅速變化。這些民族國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獨立發展的資格，而且國內經濟管理策略已經發生不了作用了。從這種觀點看，國際化被視為一種席捲世界的潮流。在這股浪潮下，技術與不可抗拒的市場力量正在以任何人都無法扭轉的方式改造全球體制。

但是全球化並不是偏離常軌，也不是一種激進的變革，更不是人為策劃的結果，它只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長期動力的一個部份。全球化無疑是西方現代文明擴張的偉大結局。這說明了商品經濟史中發生了一系列的形勢變化。這種經濟是在個體主義和普遍主義的環境下，一開始就以開放交流為基礎，以主觀性和物質成功的形而上學體系為依據的經濟。全球化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徵：首先，在國際貿易中，工業製成品的地位超過了原材料，而且相對於真正的經濟生產來講，金融領域已經獲得了相當的獨立性。其次，1980 年代的大市場消除管制措施有效的預示了資本主義的來臨不再是以實業為主，而是投機

性的(今日世界範圍內流通的貨幣總量估計高於產品實際價值的十五倍)。最後，全球化的另一個新特點是市場普遍化。現在的交易涉及了以前各個獨立的領域，文化、服務、自然資源、知識財富都成了自由貿易體制的組成部份。所有東西都轉化成貨幣。一種活的事物，一旦進入這個體系，就會變成一種商品，一種死的產品。而且該體系的參與者也和以前不再相同。過去的參與者主要是民族國家。今天，當金融市場佔支配地位，銀行控制著逐漸與實體經濟脫離關係的金融領域時，參與者也主要變為支配投資和貿易的跨國公司。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正讓位於一種由全球參與者建構的世界經濟(王列、楊雪冬，1998: 5)。

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特徵是顯示出的是「新國際勞動分工」，及生產的跨國化、生產過程(即使是同一種商品)通過轉包合同的全球化。在生產方面勞動的國際分工可能算不上是新鮮事物，但新技術使資本和生產具有一種全新的流動性；為了追求有利於資本而不利於勞動的最大利益，以及不受社會與政治干預的自由，生產似乎在不停的改變其位置——這就叫做靈活生產。由於這些緣故，分析家們注意到全球資本主義與過去類似的實踐已發生質的區別，它確實是資本主義一個新的階段。

這個新階段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即資本主義在國家的意義上發生的非中心化。換言之，現在已經越來越難以指出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是哪個國家或哪個地區了。不只一個分析家(包括處於權勢地位的分析家)發現，全球資本主義在生產組織方面逐漸成為一個由城市構成的網絡，沒有明確界定的中心，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遠遠超過與其鄰近的窮鄉僻壤的聯繫(汪暉、陳燕谷，1997: 466)。

把當代全球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已經取代民族國家而

成為經濟活動重鎮的跨國公司，它不是一個輸送資本、商品和生產的被動的紐帶，而是這種輸送及其方向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在公司裡是高度集中的。隨著跨國公司的權力日增，從內部控制經濟的權力受到限制，全球經濟秩序的調整成為首要任務。這不僅表現為全球性組織越來越多，而且出現了為整合經濟的運作而建立地區性跨國組織的努力。

生產的跨國化既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統一性的根源，同時又是前所未有的分裂的根源。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存在著全球同質化的現象，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個分裂的過程；以全球的角度講，資本主義的中心消失了，以局部的的角度講，生產過程分解到比國家還要小的各個區域和地區。超國家的區域組織，如歐盟、亞太經濟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在全球層面表現了這種分裂；一個國家內部相互競爭的不同地區競相招攬跨國資本，則在最基層的局部層面表現了這種分裂。

最後，生產的跨國化動搖了原先那種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劃分。第二世界及社會主義世界已經逐漸消沈。於此同時，新的全球結構同樣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不再那樣清楚區分了。

隨著跨國資本的發展，文化也將進入跨國化的過程中，形成所謂的全球文化，也就是說，跨國資本主義促使各種文化的接近，同時透過各種傳播媒介相互的交流、滲透乃至融合，改變了各種文化的特點。然而在這全球化的過程中，西方是居於主導地位的。對於全球化的意涵若以西方的語言來述說，是指國際資本在全球市場中無止盡的流動過程，沒有疆界的限制，資本得以在全球範圍下自我實現。然而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全球化可謂是西方國內雇傭關係在全球的延伸與推廣，同時西方國家透過跨國資本的運作、全球性的資本化以及訊息

的傳播，大力推動文化全球化的進行，並且摧毀各個民族文化固有的機制。做為第三世界的知識份子也感覺到這股浪潮對自身的民族文化所產生的衝擊，因此產生了一些對抗性的策略，其中一個明顯的對抗性策略就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主義這個變了形的後殖民概念。當代西方的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家開始對東方以及第三世界文化產生興趣，試圖在承認非西方文化的獨特價值的同時，找出並擺脫自己文化呈現的「再現的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本研究在分析教材時，即考慮到教材內容是否隱含著西方國家透過全球化的途徑，企圖影響非西方國家(臺灣)本土的文化意識與社會價值，甚至產生削弱了本土的機制。本論文基本上採取一個預設立場，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與非物質價值的確影響或反映在台灣的文化產品上，尤其在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英語篇，浮現一種隱藏的、不可見的西方文化價值。而本論文檢視的作法，是使用後殖民論述中的數個基本特徵來加以檢驗，在全球化概念的部分，例如「世界性」(cosmopolitan)¹³、「商業性」(commercial)¹⁴、「技術性」(technical)¹⁵等，皆為全球化論述的操作性概念。透過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的揭露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是否具備了被全球化加以感染的種種特性，如果有，又符合了哪些特性？經由對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全球化概念的檢視，將有助於本論文以相同作法朝向對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同後殖民概念相互檢驗的方向進一步前進。

¹³ 全球化推展的過程中，資本、產品、訊息等生產工具的流通是無疆界的，因此全球性是包含世界性的概念。

¹⁴ 全球化基本上是以經濟為起始的，是一連串的貿易交換行為(trading exchange)。

¹⁵ 技術性指的是全球化流通的商品具有高度的人為性質，是高度技術發展的產品。

第三節 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被稱為繼沙特(Sartre, Jean-Paul, 1905-1980)之後法國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家，他在符號學、精神分析批評、解釋學、解構主義等領域均有卓越建樹。羅蘭·巴特所創立的符號論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符號論深受法國傳統語言學和文學評論的影響，在對考察人類、文化、人的思想和社會行為等問題，具有重要理論上和方法論上的意義。

羅蘭·巴特的《符號學要義》(Elements of Semiology)一書完成於1967年，在他這本書中，其對符號學的探討基本上仍然大部分的繼承了瑞士籍的法國著名語言學家斐迪蘭·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語言學傳統，但是在某個程度上羅蘭·巴特的符號論卻又跟索緒爾語言學中的一些論述有著明顯差異。羅蘭·巴特符號論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對索緒爾語言學當中的幾個基本觀念提出修正和補充，也為語言符號學的詮釋創造了新的道路。在討論巴特與索緒爾的差異前，先來回顧一下索緒爾語言學中的幾個重要概念(Culler, 1992)：

1.能指和所指：有關語言理論，索緒爾第一個要探討的便是符號的本質。索緒爾把符號當作是形式和概念的結合。表示意義的形式稱之為能指(signifier)；被表示的概念叫做所指(signified)。雖然可以把能指和所指說成兩個獨立的實體，可是它們只能作為符號的組成部份而存在。能指和所指的結合就構成為一個任意的實體。也就是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arbitrary)。而索緒爾所謂符號的任意性，事實上指的是能指和所指之間沒有天然或必然的聯繫。我們日常語言的使用，只是單純

的將一個能指和某個概念聯繫起來而已，而不使用另一個能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在原因。既然能指和所指之間沒有什麼特定的聯繫，所以這正說明了符號的任意性。

有關索緒爾在符號的任意性上的說明，如果我們把它當成一般的語言分析原則來看待，那就很大程度的限制了索緒爾有關符號任意性論述對語言分析的影響。雖然，索緒爾認為符號是任意的，因為在能指和所指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繫。但是，如果語言僅僅是解釋概念名稱的集合，那要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就很容易了。同樣的，要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就變得容易的多。索緒爾在這裡注意到，或者說是他觀察到每種語言其實都用它們自己的方式在表達或組織世界，各種語言不是單純的為存在於世界上的各種客觀事物命名，它們都不斷且持續的在創造自己的領域。因此，每一種語言即使在某種程度上是保存了符號的任意性質，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有其與眾不同且不可替代的結構特徵。這種不可替代的結構特徵，正是作為所有不同語言間相互區分的關鍵。

巴特認為，事實上符號是被一種片面的決定所供給的。這些被組合的語言，也就是詞的技能(logo-techniques)。使用者遵循這些語言並根據它們描述信息，但是這和他們的推敲(elaboration)並沒有任何關係，換句話說，這裡所說的就是語言學裡最基本的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

基本上，人為的特徵不能改變信息的規定本質。符號的使用還是必須遵循著大部分人所遵守的契約。同時符號並非完全是任意的，它們是以集體的決定為條件的，也就是使之合乎規範。我們可以說，詞的技能僅僅是功能經常擴大的詞彙。因此個人運用符號的新方法被一種社會範疇所凌駕。

羅蘭·巴特對於「任意性」原則的補充，正是說明了人們在使用語言上的被動性，而這種被動性約束著人們使用語言符號的自由。他以時裝雜誌中的各個廣告及廣告的說明為例，強調廣告設計人通過廣告各個符號，試圖表達其能指的方向和內容。只要廣告設計者使用的是某種符號，他要用某種符號指向什麼就指向什麼，他要讀者通過符號將注意力指向什麼就指向什麼。因此，巴特認為語言符號的使用在當代社會中並非依個人的喜好而完全是任意的，它們還是必須在集體決定的基礎上運作的。

2. 語言結構和言語：在索緒爾的語言理論裡面，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語言結構(*langue*)和言語(*parole*)這兩者的對比。語言系統是一個由形式構成的系統；而言語是實際的說話，是依賴於語言系統的言說行為(*speech acts*)。語言系統是人在學習語言時所吸收的那種東西，是一套形式，或者說是「通過語言實踐存放在某一社會集團全體成員中的寶庫，一個潛存在每一個人的腦子裡，或者更確切些，潛存在每一個人腦子中的文法體系(*grammatical system*)」。另一方面，言語則是「語言的體現」，對索緒爾來說，言語是說話者藉著運用語言規則來表達出他個人思想的各種元素。在言說行動中，說話者選擇並組合語言系統的元素，賦予這些元素具體的聲音以及心理作用，即語音(*sound*)和語義(*meaning*)。所以，言語僅僅是個人的講話行為，它本身並不屬於系統。

因此，索緒爾指出，語言學家的主要研究對象應該是語言系統。在分析語言的時候，語言學家所要做的並不是去描寫言說行為，而是要確定構成語言系統的單位及其組合規則。換句話說，就是要把語言當作符號系統來研究，要去確定的是在語言系統中發揮作用的那些因素，因為正是藉著這些因素，符號之間才有了區別，符號也才能被獨

立的創造出來。

至於羅蘭·巴特，他對於索緒爾語言學概念的看法首先就是打破了傳統語言學和符號論關於「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二元對立模式。他認為，能指和所指並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而每一個「所指」的位置都可能被另一個「能指」所取代。這是因為任何「所指」在不同讀者心中都會產生讀者所聯想的各個所指群，而這種新的所指群在讀者心中的意義的重新生產，是決定於讀者基於本身所處的社會結構及文化背景所產生的想像。所以，所指只要是存在於特定社會文化背景的兩個人關係中，它就可以不斷的自我膨脹和自我生產。在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符號功能性的運作是一種開放的系統。

巴特認為，在文字的語言中，在作為一群有限規則的語言以及被這些規則的標題所支配並且在其變化中實質上並沒有受到限制的言語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大的平衡。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一個特殊的系統中，如文字的服裝系統，言語甚至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們正在處理的是一種沒有言語的語言。

巴特針對這種特殊的狀況提出了他的解釋。他加入了「第三者」--預示的成分(a third, pre-signifying element)的概念，即一種提供詞義支持的物質或實體。這導致我們在符號學系統中認識到三種（而不是兩種）階段：物質階段(the matter)、語言階段(the language)和習慣用法(the usage)階段。物質階段就是一種預示的成分。例如在一個像「一件或長或短的衣服」這樣的片語中，「衣服」僅僅是完全屬於衣著語言的變化（長或短）的支持——一種在一般語言中所不能知道的特徵。

巴特對於傳統語言觀「語言」和「言語」關係的這樣一個修改，不僅更擴大了語言使用解釋的範圍，同時語言本身也可以被創造性的

發展。因為如果語言需要的是一種物質而不再是言語，那語言的功能就變成是實用，而不只是意義。

在羅蘭·巴特符號論的探討中可以看出，符號在巴特的眼中具有其自在的生命，是個活生生具有自由意志的個體，它不但包含了表面的意義，也包含了內在一系列它所搭載的相關事物的意義。同時符號也具有自我膨脹，不斷自我生產的能力，符號神秘性的分析不僅要注意符號運作中各個因素的變化，而且也要考慮到符號運作各個因素的存在所產生的關係網。更複雜的是在符號之外還存在著一系列可供想像和潛在的各種可能性領域。因此，羅蘭·巴特並不曾想把符號從和人的關係的連結中抽離出來，因為符號畢竟是人創造的，只不過符號的自主性使它一旦單純的和人產生連結就會發生意義，也有可能和創造者斷絕關係之後卻又去和其他人產生連結。

傳統的符號學在羅蘭·巴特手中呈現出一種不同的面貌。符號作為一個符號不再只是意義或暗示的表現，而是一種開放而活潑的系統，端看符號使用者如何去運作和指向。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巴特認為這種符號的解讀，有時是武斷的，有時並不是個人就能自由組合加以定義，而是依靠絕對的權威。

透過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以及羅蘭·巴特的補充，將記號分為能指與所指兩個組成分子，可以用來檢視其在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上的意義。如前所述，能指是用來表示意義的形式，在口語上，能指就是說出來或聽的到的有意義的聲音；在書面語上，能指就是有意義的文字標記。本研究中的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是為成人基本教育的學習者所設計編撰的資料。教材主要有兩種的界定方式，一是指教師用以協助學生學習的各種材料，例如，教科書、學習手冊、操作單、幻燈片、影片、錄影帶等；另一是指各種教學材料包含的題材或內容。本研究的

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則是專指台北市政府為成人基本教育之學員所設計編撰而後出版的書面資料，因此教材中有意義的文字，即為能指。在能指被說出來或以文字形式呈現出來之後，對事物的概念也就進入說者與聽者的思維中。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與能指相對應的概念，亦即探討所指的概念內容，探討文字呈現出來的概念是否具有後殖民意涵。然而在檢視的過程中，由於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因此如索緒爾所堅持的，任何時候都要區分共時觀與歷時觀。也就是說在分析教材內容的概念時，除了注重特定時間內，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同時由於語言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現象，語言是人與人相互接觸時所使用的溝通工具，是具有一種媒介的作用，是經由時間演變來的，必須關注語言在歷史上的演變因素。總而言之，透過索緒爾語言學理論要檢視的是教材中的文字在現今社會所表達的概念與意義，同時是站在歷史、社會結構的脈絡探討文字所呈現出的概念。

第四節 後結構主義

對於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區分，怎樣界定何為結構主義，何為後結構主義的這些問題上，學術界是有很大的分歧存在的。有些人認為後結構主義是對於索緒爾的更極端的閱讀，另外一些人認為它是結構主義自我反思的一個環節，也有人認為它是對結構主義的批評，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對結構主義的發展(P. Rice and Waugh, 1997)。後結構主義可謂直接源自於結構主義，是透過一批「少壯派」結構主義者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所產生的結果，亦是結構主義革命的深入和極端化(楊大春，1996)。

總的來說，後結構主義其實與結構主義是相生的，沒有結構主義就沒有後結構主義，結構主義也正因為後結構主義的發展而更豐富。因為 post(後)這個字詞，既有揭示時間上的先後，也指出意義上的正反，也就是說，後結構主義既是從結構主義發展中衍生出來的，但也為結構主義發展的意義，又其正面上的肯定，但又提出不同於結構主義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往往是恰恰相反的意義。

對後結構主義的認識，在此試圖先透過後結構主義相關的論述學者的思想，逐一釐清後結構主義的思想特徵與意義。

一、後結構主義的主要論述學者

1966 年，法國有家文學期刊刊登了一幅後來常被轉載的漫畫，畫的就是李維史陀(Claude Lévi - Strauss, 1980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 - 1980)、米歇·福柯以及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 -)。這幅畫不需要任何文字說明，直到後來才有了一個標題，稱為「結構主義者的午宴」(Le dé jeuner des stucturalistes)，這幅漫畫說明了這些人的出現，為法國的精神生活孕育了一種新的力量。這四位智者在

棕櫚樹下聚在一起，似乎共同提出了一種意識型態，意即「結構主義」。隨著福柯與拉康(Jacques Lacan, 1901 - 1981)的加盟，再加上已經聲名遠播的李維史陀與羅蘭·巴特，一種新的哲學便初具規模了。這是法國整個思想史中，數不勝數的結晶之一，它終於將迄今為止各種支離破碎、看似迥異的觀念結合成了一個協調一致的整體(Sturrock, 1998: 1)¹⁶。

後結構主義不是一種信條，只是一種方法，因此絕對不會有人會身著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裝扮、或者追求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也就是說，後結構主義僅僅是一種考察問題的方法，是一種處理問題的特殊方式，也唯有如此，後結構主義者才能在某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合理地組織有關材料(Sturrock, 1979)。

現今所謂著名的結構主義者，李維史陀是一心一意地認同了結構主義，同時他也並不排斥在李維史陀上冠上結構主義者的封號，他一生的工作以及這些工作所依賴的研究方法都是一直因循不變的，從其有些作品的題目本身就是充滿了結構主義色彩，如《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1949)或兩卷本的《結構人類學》(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deux, 1958年與1973年)等，其中，在利用各種有關親屬制度、圖騰(totem)制度和神話等方面的經驗材料方面，李維史陀總是以為結構主義的方法是最合適的(Sturrock, 1979)。

其他被稱為結構主義者或後結構主義者的思想家，卻是不太願意在自己身上被貼上「結構主義者」的標籤，他們往往將這種標籤看做是對思想自由的嚴重侵犯。羅蘭·巴特就一直在探索、追尋兼容並蓄

¹⁶ 在渠東等人譯的《結構主義以來-從列維-斯特勞斯到德里達》一書中，將李維史陀、拉康、德里達、福柯皆視為結構主義學者，筆者則認為唯有李維史陀是結構主義者，其餘學者為後結構主義者。

的研究方法，其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在不同理論立場之間不斷轉換這是很必要的，因此即使是對其自身來說，自傳也只是別傳。福柯也曾公開聲明他不願意被人們當成一位「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他不希望自己在意識型態或知識份子領域裡具有一個固定的立場，只希望在這個領域裡來去自由、出沒不定，在自身確證無疑的情況下，對知識和權力的各種歷史形式與現實形式進行追問。最終，福柯也以「成為自己」這種詭譎深邃的思想風格，成為了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的當代的福柯，對福柯來講，每一次成為自己，都是又一次「擺脫自己」。至於拉康，這位可以說是法國最有名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家，人們都知道他是一位自高自大、獨來獨往的人物，不斷地大肆攻訐所有其他理論家，甚至包括它的學生，也在批評之列，他是很喜歡別人亦步亦趨地追隨他，而自己卻是從來不去追隨別人，那怕與別人有一點瓜葛。做為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pied - noir)的德里達，由於是生於一個地域和文化上的邊緣位置：法國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的埃爾比亞爾(El Biar)，不得不接受一種附屬的、邊緣的位置，然而這也「逼使」他對權威和合法性的根源的探索，同羅蘭·巴特與福柯一樣，德里達堅持駁斥了某些先驗思想體系，駁斥的這些體系是曾經為其自己的追隨者賦予了一種獨斷地位，使他們居高臨下地佔據一種優先地位，並以此對其他事物進行大肆評斷，與此同時，德里達也始終在各種思想之間游移不定(Sturrock, 1979；方生 1999)。

這些所謂的「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實際上在某些觀點上是有衝突的，而在其他觀點上卻沒有什麼衝突，換言之，他們的著作中有很多共通之處的，可以說這些「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具有共同的學術淵源，這種共同的學術淵源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語詞方面，特定的術語只要是在某部著作中反覆的出現，就肯定會在其他人

闡述這部著作中反覆出現。這個術語就是「記號」(sign)，它在意指詞庫(the lexicon of signification)中佔據著中心地位(Sturrock, 1979)。

這個專有名詞是從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頗具建樹的著作中來的。索緒爾本人在 20 世紀早期曾經專門從事過自然語言和人類語言的研究，這些研究為所有現代結構主義學說奠定了基礎。從根本上來說，這五位思想家都得益於他對語言的真知灼見，特別是他對語言學基本單位，亦即語言記號的見解。所謂記號，語言中任何一個詞都是一個記號，而語言就是作為一個記號系統發揮作用的(Sturrock, 1979)。至於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在本節的第一部份已經簡單探索過，在此就不再重新解釋。

二、後結構主義的特徵

(一)出位的特徵

後結構主義最明顯的思想特徵就是出位¹⁷。出位就是既出於其位又出乎其位，位置是相同的，既是所源出和出發的位置，又是所亦出和出離的位置。出位是和定位密切相關的，如果沒有定位，也就沒有所謂的出位，因為根本無「位」可「出」。出位意味著思想的豐富性和不可歸屬性，是意義無盡生成變化的運動過程，「位」是相對的偶然的靜止的常態，「出」是絕對的必然的運動的變異。任何理論框架和操作模式都不可能確切地描述出位的思想和窮盡其變化，但出位的思想在任何理論框架和操作模式內的分析 and 描述又都是可能的和可以接受的，出位總是相對於「定位」的出位，任何逃脫框架束縛的出位都是在其被置入特定的框架之中的時候，一旦說到「是」，隱含的「不是」就隨之而來，一旦說到「在」，潛藏的「不在」就接踵而至，出位總是處在既是又不是，既在又不在的動態的意義生成和變化的過

程之中。可以以任何理論框架為例對出位的思想進行分析和描述，出位的思想總是顯的有些「例外」，既是沒建設性的實例，又是破壞性的實例，在守例的同時破例，出位的思想實際上總是「例外的思想」(方生，1999: 1)。

因此後結構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出位的思想。它既是思想的「出位」又是思想家的「出位」。也就是說，後結構主義既出於結構主義又超出於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如拉康、羅蘭·巴特、米歇·福柯以及德里達等人既是忠於結構主義的原則但卻又是背叛了結構主義的原則。後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是從結構主義脫胎演變而來，與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無法擺脫這種聯繫以獲得一個獨立於結構主義的命名。對後結構主義的理解完全對結構主義的把握。但這些來自於結構主義思潮內部的思想家雖然處身於結構主義的內部，卻置身於結構主義的外部，採取一種外在性的立場，首先對結構主義方法和假定提出質疑，其核心在於不承認有所謂語言、文字的結構，公然主張超越結構主義。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德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拉康的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福柯的歷史作品(historical writings)以及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的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這些都是作為後結構主義者在抵抗的那些固定的、確定的意念(notions)的特徵(方生，1999；Isaace, 2001)。

從出位的特徵來看，則後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必然有某些地方是相通的：

1. 兩者的概念皆為攻擊人類主體(自我)：從希臘時代到尼采時的哲學家對自我的認識是作為自由的、有意識的、可以意識到的以及自主的中心，但他們開始攻擊這種觀念，認為自我是被侵蝕的。

¹⁷ 此「出位」的思想，主要引自方生所著的《後結構主義文論》。

2.兩者的概念都是有檢視意義的觀念：只是結構主義是以語言學(semiotics)的概念來檢視意義；後結構主義則用語言學更進一步地批判意義。

(二)後結構主義主要批判的重點是：1.穩定的記號(stable sign)；2.人類主體性(human subject)；3.認同(identity)；4.真理(truth)。

在後結構主義看來，語言遠不是經典的結構主義理論所認為的那樣穩定不變。後結構主義將語言界定為一種權力範疇，認為語言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同宰制產生關係，這種宰制可以稱之為「語言的囚牢」(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語言是規範人們思想的、是具有宰制與管制的社會目的，語言並不是一個包括一系列對稱的能指與所指的涵義明確、界線分明的結構，而是一張漫無頭緒的無盡意義區分與播撒的網，各種要素都是不斷相互作用和生成變化的，任何要素都不是一清二楚的，每個要素都要受到其他要素的制約和影響。很顯然，後結構主義是對結構主義的否棄與超越。結構主義認為符號可以完整地表達出存在主體的內心體驗和思想情感，後結構主義則認為符號中的任何要素都不是完整地存在著的，企圖在說的或寫的東西中把主體自己完整地展現出來只能是夢想，符號所表達的意義總是支離破碎的，不可能與主體所要表達的意義完全吻合。結構主義特別強調整體性和中心性，認為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如果單獨取出來就會喪失意義，只有依據於某個整體或中心才具有意義；後結構主義則恰恰相反，否定了整體性和中心性，以為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具有多重意義的可能性又沒有確切的意義，整體和中心只是相對的，實際上不存在任何終極的意義。因此說後結構主義的特徵是一種出位的思想，根本原因就在於後結構主義所有這些對立於結構主義理論和原則的結論恰恰是從結

構主義理論和原則出發所獲得的(方生, 1999)¹⁸。

(三)後結構主義的共同性

後結構主義陣營中, 儘管存在著許多分歧, 但在以下幾個方面是具有明顯的共同性(楊大春, 1996):

1. 後結構主義主張「主體離心化」(décœntrement), 各位大師從不同角度削弱了主體的地位。拉康用語言學模式重構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 以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取消了實體性主體(自我)的位置。傅柯把人看做是十九世紀的一個「發明」, 宣稱他已經臨近終結。羅蘭·巴特宣布「作者死了」, 取消作者對於文本和讀者的權威地位。德里達透過閱讀先哲的作品, 發現人在目的與死亡之間的漂泊游離。後結構主義關於主體消亡的觀點與結構主義大抵相同, 但德里達更傾向於以遊戲的立場對待主體問題。

2. 後結構主義對邏各斯中心論(la logocentrisme)¹⁹展開了批判, 但並未因此陷入非理性主義。結構主義對傳統哲學、語言學展開了批判, 但它從根本上看仍然囿於邏各斯中心論之中。後結構主義力圖透過使索緒爾的語言學革命極端化而衝破邏各斯中心論。例如, 傅柯既批判了理性的專制, 又看到了它的生產性, 從而沒有陷入兩元對立的批判模式中: 要麼承認理性, 要麼陷入非理性之中。德里達透過揭示傳統文本中的隱喻、邊緣性因素, 來發現邏各斯與非理性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

3. 後結構主義和結構主義一樣, 主張由外部分析回歸文本內部分析。但是與結構主義的靜態的結構分析不一樣, 後結構主義主張文本的生

¹⁸ 本段參考方生的著作外, 尚參考http://carmen.artsci.washington.edu/~panop/subject_P.htm#POSTSTRUCTURE網路資料。

¹⁹ 邏各斯中心論指的是「為什麼一事物是其所是的基本理由、用來解釋一個特殊學科中的現象的原則和方法。那些在一事物中使它成為對於我們可理解的特徵、一事物的基本原理」。引自《哲學辭典》, 1999, 貓頭鷹出版社。

產性。讀者應當看到文本是處於運作之中的，讀者也可以在閱讀中玩字詞遊戲，使這種運作成為多樣的、多向的。於是，文本的單意義消失了，它自我解構，導致意義增殖和不確定性。羅蘭·巴特對「可讀的」(lisible)文本和「可寫的」(scriptable)文本進行了區分。他看重的是「可寫的」文本。在此，讀者的地位實現了。讀者更多地關心文本的愉悅，而不是意義，但是存在著「愉悅」(pleasure)和「極樂」(bliss)之間的不同，羅蘭·巴特更關注後者。德里達關於「讀與寫是單一姿態中的雙重」的觀點則區分了傳統閱讀與解構閱讀之不同。前者力圖重複、重構文本主義意義，後者指向意義的增殖。

本研究即採用後結構主義作為方法論的立場，利用後結構主義將語言界定為一種權力範疇，認為語言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同宰制產生關係；另外後結構主義則認為符號中的任何要素都不是完整地存在著的，企圖在說的或寫的東西中把主體自己完整地展現出來只能是夢想，符號所表達的意義總是支離破碎的，不可能與主體所要表達的意義完全吻合。本研究透過後結構主義對語言符號的認識作為分析教材時的預設立場，預設教材的內容文字是同權力、宰制有關連性存在，並作為在以全球性、後殖民性以及語言性分析教材時的依據。

第五節 相關實證研究

本節將探討有關成人基本教育的相關研究文獻，首先探討成人基本教育目前實施的狀況，接著分析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內容，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以利於本研究的進行。

壹、「成人基本教育」實施現況

成人基本教育的相關研究中，對於成人基本教育的意義、背景以及現階段成人基本教育辦理的方式、類型、目的等實施狀況，均有詳細的介紹，在第一個部分首先就從這些部分著手：

一、成人基本教育(ADULT BASIC EDUCATION, ABE)的背景

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從字面上來看，首先可以知道所要提供教育的對象是成人，成人由於其生活經驗比起兒童來說是比較豐富的，也就是說，成人已經是扮演著某種社會角色的，並且會為該角色負責的；其次，教育，則是指有意識的、有目的的、有計畫、有組織的活動。因此成人教育則是指為不再參加正規學校教育的成人，辦理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活動。

台灣地區成人教育歷經四十餘年的發展，目前已進入成人教育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dult education)²⁰時期。這全面制度化的現象，卻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包含「成人教育法」的立法完成、成人教育政策的合理形成、成人教育計畫的研修落實、成人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成人學習需求的充分瞭解、成人教育機構的適時設立、成人教育人才的積極培養、成人教育教師的證照制度等等(胡夢鯨，

²⁰ 林清江於 1993 年在「探討成人教育在未來教育改革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專題演講中指出：制度化完成必須具備三個重要的條件：1.明顯的社會需要存在；2.有足以解決與滿足社會需求的價值觀念之形成；3.根據前述的價值觀念建立起某種行為型態，逐步推廣，為全民所接受，最後即

1993；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1995)。

近年來，政府也開始積極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為配合成人基本教育政策的推行，教育部頒佈了許多有關成人基本教育的計畫與實施，如民國八十二年「新民專案—加強成人基本教育五年計畫」、八十五年「教育部獎勵及補助成人教育活動實施要點」、「掃除文盲實施要點」等，成人基本教育是推動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政府並預計在五年內將文盲率降至百分之二以下。

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現代社會的個人身份定位，逐漸從傳統社會中由先賦地位(*ascribed status*)所決定的現象，轉變為由個人後天的成就地位(*achieved status*)所決定，而影響個人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經濟地位的因素，包括教育、收入、職業等，也就是說，教育與社會階層化具有重要的關連。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公平性，必須確保教育機會的均等，對於早年失學或中途輟學民眾基本教育及進修教育機會也更應該予以保障。因此，政府為低教育程度及處於不利地位的成人，提供一條重要的教育管道，幫助他們脫離文盲，充實基本生活知能，進而實現人生的理想。這類為成人提供基本的讀、寫、算等社會技能、生活知能、生產技能及科學文化素養等而設計的一系列學習活動，即為成人基本教育(羊憶蓉，1999；曾文昌，1999)。

二、我國成人基本教育的現況

政府為培養失學民眾具有聽、說、讀、寫的能力，並充實其基本的生活之能，同時也希望在五年內將文盲率降低至百分之二以內。因此政府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的方式、教育的場所、教育的內容等，也就出現許多彈性，首先是辦理方式上，鼓勵民間與政府共同合作來辦

完成制度化。

理，以發揮最大的效果；其次，在教師編選教材上，讓教師依據學生的學習特性以及學習需求不同，提供合適的教材。

現階段成人基本教育的辦理，主要是失學國民的補習教育，包括國中小學補習學校，以及成人基本教育。因此我國成人基本教育的辦理上包括有三種類型，國小補校、國中補校及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成人教育研習班與國中、小附設補校在修業年限、科目、教材、上課地點、成績考察等方面皆有不同：(林振春，1999；何青蓉，1997)：

(一)補習教育

依據現行補習教育法規定，補習教育目的在補充國民生活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記憶，增進生產能力，培養健全國民，促進社會進步。國民補習教育對象為已逾學齡未受九年國民教育之國民。

國民補習教育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之：

1.國小補校

國小補校皆附設於國民小學內，分初、高兩級。初級部修業一年，高級部修業兩年，修讀結業可取得國小畢業資格證明書。

2.國中補校

國中補校招收未滿十五歲以上具有國小畢業或同等學力的民眾。教材沿用國中教科書，或由教師自編教材。學生修業三年，成績及格者可取得國中畢業資格證明書。

(二)成人基本教育

成人基本教育(adult basic education)一詞係從西方國家引進，在美國與加拿大兩國使用相當普遍。根據《國際成人教育字典》(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adult education,1990)，成人基本教育的三個主要成分為：語言技能(讀、寫、說)、算術及社會生活。也就是說，成人基本教育的內涵應包括基本的識字教育，以及生活於當代社會

中，個人為完成其角色與公民責任所應具備的知識和技能。

1.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我國政府從七十九學年度起為徹底掃除文盲，訂定辦法鼓勵學校、機構、民間團體等辦理成人基本教育，以「識字」教育為重點，另涵括一些生活基本技能的傳授。成人教育研習班通常設於國民小學內，每期兩個月，分初、中、高三期。從八十一學年度到八十五學年度，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金門縣、連江縣開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的校數、學員數、經費，都有增加的趨勢(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1995；何進財，1997)。

我國的國民補習教育與成人基本教育本質上是類似的，重疊之處在兩者共同強調語言、算術和部份基本知能的學習。最大的不同在於國民補習教育乃本於國民教育，是為補充正規教育的不足，其內容並沒有反映出以成人為本位或問題中心的思考模式，所強調的是基礎的學科內容，甚於培養學習者作為一個現代國民生活所需的基本的知識與技能。對於成人基本教育的基本理念分析如下：

(一)學習動機方面

1.提供成人進修機會

根據內政部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人口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台閩地區十五歲以上，文盲率為 5.09%。教育部除補助地方增設國民小學補習學校外，並會同省(市)政府教育廳(局)訂定「獎勵及補助成人教育活動實施要點」，獎勵國民小學或其附設國民小學補習學校開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主要為失學民眾、成人充分提供補救性質的教育，以實現人權的尊重、社會正義的公平、對弱勢族群的照顧以及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2.成人自行決定學習的機構

從人本主義的觀點，強調的是人類的自由與自主性，人類並非完全如行為主義所強調的，也就是說，人類並非完全受環境制約而產生制約反應，也並非不能擺脫環境限制而獲取絕對的自由和自主。因此，從人本主義的觀點，成人選擇適合自己再學習的機構以及學習的方式，是自主的，也就是說個人有相對的自由和自主性，可以自行做決定。

(二)學習內容方面

1.強調實用、功利等知識的重要性

隨著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識字能力的要求逐漸提高，成人基本教育的提供就在於使成人融合於現代社會生活，為提供成人更適應現代生活必需的知識，成人基本教育教育的內容首要部份，在強調語言的聽、說、讀、寫的能力、以及算術的能力，也就是培養成人學習者基本的語言與算術技能。從進步主義的觀點，這種強調實用知識的重要性，可謂是一種功能性的教育。

2.道德、審美等博雅學科

除了教導失學民眾實施基本的識字教育外，也為培養生活於當代生活中，個人為完成其角色與公民責任所必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也就是說，成人基本教育進一步地重視加強現代國民基本素養的陶融。因此，成人基本教育課程，以識字教學為核心，兼顧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三)學習方式方面

成人不論在生理、心理上的發展，都不同於兒童與青少年，因此在教學上，也應有別於傳統學校教法。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學方法未能突破傳統的課程教學，使成人難以適應，導致輟學率偏高，此一現象，則有待研發彈性的多元的教學方法加以解決。而近來受到重視的

電腦輔助教學也開始試圖應用在成人基本教育上。

電腦輔助教學是以電腦為教學媒體，運用事先規劃的教學內容，以協助教師從事個別化的教學，輔助學生依據自己的進度或需要，循序漸進學習教材，達到個別化、補救教學或精熟學習的編序教學活動(吳宗雄，2000)。

電腦輔助教學是依據行為主義強調學習是反應刺激的過程，並非是學習者影響刺激之交互作用的過程。對於學習的目標，也認為是預先決定的。因此其教學方法的原則衍生出如編序教學法、電腦輔助教學法的方法：

- 1.目標的預知：明確告訴學習者學習某一目標的重要性，對於即將學習的事務亦需詳加說明。
- 2.適當的練習：學習者有充分的機會練習其尚未成熟的技能及目標要求的行為。
- 3.結果的知識：給予學習者回饋，使其了解反應是否適當，必要時給予協助，使其反應能更適當，進而達到預期的行為改變

三、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缺失

教材對於教育實施的成效是具有很大的影響，所謂「工欲善其是，必先利其器」，因此欲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必須先對教材有一良善的、系統的規劃。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實施至今，現行的教材也出現一些缺點，不僅擔任成人基本教育的教師指出教材不切合學生所需、無法配合學習者的能力等，學習者也認為教材艱深、教材不夠生活化、對教材內容不感興趣等。於是欲發展與改進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是必須從瞭解現行教材的缺失著手。

當前成人基本教材主要可歸為以下六點缺失(黃明月，1997)：

- 1.主體零散，缺乏結構性，較不容易有系統的提升學習者是字能力與

基本生活知能。學習者即使獲得廣泛的、基本的概念，然而這些概念之間卻缺乏階層結構或程序結構。

- 2.課文體裁以韻文為主，不容易培養學習者語文運用能力。以韻文方式撰寫課文，徒具形式之美，但語句的意義往往是不清楚的。
- 3.課文概念淺顯，生字艱澀的兩難，影響教材的適用性。用艱深難懂的字要闡釋一個簡單的概念，是會造成教學上的困難的。
- 4.作業練習設計缺乏與教學目標、學習者背景知識能力間的聯繫，其功能不彰。
- 5.教材課文本身與補充教材未做區分以及教材缺乏教師指引設計，提高教材使用的難度。
- 6.缺乏形成性的評量過程。

貳、成人教育教材之相關研究

在「成人教育教材之相關研究」這個部分將針對國內學者對於成人教育的教科書其中所隱含的各種意識型態所進行進行回顧。這些相關研究的研究對象包括有國小補校教科書、國中補校教科書以及成人基本教育的教材，同時透過各類型的意識型態觀點、家庭概念以及成人基本教育教材與成人學習需求研究報告與成人脫盲識字字彙內涵相應的情形等觀點，作為研究分析成人教育相關教材的重要基礎。本節將先探討對於成人教育的教科書的分析研究狀況，並希望透過分析這些相關的研究內容，能夠對研究的進行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先加以認識與瞭解，以有利於日後分析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一、對於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相關研究

對於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相關研究分析中，楊深耕(1999)曾透過

文獻探討以及內容分析法來分析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內容、特色及限制，以及其與成人學習需求研究報告及成人脫盲識字字彙內涵相應的情形，並從分析、探討教材內容的研究過程中發現問題，並提供教育當局與成人基本教育教師，作為未來改進與發展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之參考。其研究的進行方式是先藉由文獻探討的工作，對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相關問題與策略進行分析，緊接著分析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的內涵、特色及限制。最後，對於我國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在成人學習需求與成人脫盲識字字彙的分析上，透過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成人學習需求以及成人脫盲識字字彙作為分析類目。其研究主要結論，在 1.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分析方面：(1)教材內容部分，會隨該縣市教育主管單位的理念或教材編撰者的認知不同，展現出不同的教材內容；本土性的鄉土教材以及轄區的地理、風土民俗民情的內容日益增多；課文文體以韻文為多數，少數以敘述文呈現；課文除呈現識字功能、增進生活知能外，另安排相關的學習活動，拓展不同學習管道與經驗。(2)教材的目標與屬性方面，教材的屬性與推動成人基本教育的目的吻合性不足；教材的目標均強調增進失學民眾的生活知能，並達成脫盲的要求；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在「量」與「質」方面，有相當大的變革。(3)教材的編輯上，缺乏系統化設計，教材前後無連貫性，缺乏銜接性與繼續性；以國語和數學居多，尤其以國語科形式出現最多，其他科目較少；出版的冊數明顯差距極大，有因應政府政策之嫌；教材出版印行前，大都未經實驗、試教、修訂的程序；教材編輯成員均具有成人教學經驗，唯欠缺學習者的參與；教材設計未能考量「語言學特色」與「漢字特性」；採取「活頁抽取」形式編輯教材，突破目前教科書「固定式」的形式，以應學習者需要，隨之增減；教材發展的時間與政府推動成人教育政策有關；出版的單位概由

官方政府著力，缺乏民間組織的參與；課文字體底面設計，影響成人閱讀；為考量成人能夠參與主動學習的興趣、永續學習能力，注音符號教學與教材的設計，仍有其重要性。2.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內容反映成人學習需求方面之分析：(1)教材的編撰中關於內容的主題以專家意見或該縣市的教育主管的教育理念或編撰者主觀認定為依歸，在反映學習主體的意識與需求部分不足，並未實際進行成人學習需求的評估以符合失學民眾的需求。(2)「職場識字教育」在目前成人基本教育並未受到重視；但鄉土民俗的篇幅相當多，表示極為重視鄉土性的教材。因此各版本在不同的學習需求類型之分布不平均，教材內容偏重於某一類型，增加學習者對該類型的主題的深入了解，相對的，對於別類的主題著墨較少者，學習者因而欠缺該主題的學習。3.成人基本教育教材字彙與成人脫盲識字字彙比較分析方面，成人脫盲識字標準字彙雖已公告，卻未充分反映在識字教育教材編撰的實際上。因此，以目前各版成人基本教育教材，當做掃盲的教材，恐無法達成。

另外，楊錦蘭(2001)也透過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方法，從性別意識型態的觀點分析探討我國現今各縣市政府所出版的成人基本教育補充教材中的內文與圖片所是否存在性別意識型態。並透過閱讀國內外有關教科書性別意識型態的研究、及檢視性別偏見類型規準相關文獻，建立起分析的六大類目：兩性出現的比例、角色特質、關係、職業、衣著、對社會的貢獻作為研究分析的架構，並以之分析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中的內文和圖片。其研究發現可歸納成以下結論：

- 1.女性出現的次數上，是低於男性出現的次數，且女性出現時的稱呼有去個人化現象。
- 2.男性的職業角色上，是比女性廣泛而多元，且男性職業聲望高於女性，同時有同一工作場所有男性為主、女性為輔的現象產生。而且男

性的職業角色多為專家或勞動者型態，女性則不然。

3.性別角色分工仍舊十分鮮明，教材中所呈現的小女生具文靜、正向行為特徵；小男生則好動喜歡戶外活動，且同時表現出正負向行為。女性的角色特質為從事家務、養育子女、照顧家人；男性的角色特質則多從事知識性、公共事務或者休閒活動。也就是說男主外、女主內的兩性關係概念相當分明。而且兩性對社會的貢獻上，被提及的次數與種類，男性皆多於女性。

4.在衣著上，女性著紅色系衣著比率高達 86.67%，男性著藍色系衣著比率則為 73.33%。

5.整體而言，十五個縣市版本的成人基本教育教材，以嘉義市政府所出版國民小學附設國民小學補習學校補充教材所蘊含的性別意識型態較不嚴重，以新竹縣政府所出版的成人基本教育補充教材，所蘊含的性別意識型態最為嚴重。

綜合這些以成人教育的教科書為研究對象所進行的研究分析中可以發現到，在分析教科書的研究方法上，多是以內容分析法來進行的。同時分析的焦點是以家庭概念、意識型態等觀點為主，並未從後殖民的觀點著手。因此本研究便擬從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時透過後殖民的觀點來解析成人基本教育教材。

二、對於國中補校教材的相關研究

對於國中補校教材的相關研究方面，王潔雯(2000)曾以國中補校現代家庭教科書為研究對象，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教科書的家庭概念，並探討書中關於現代家庭在家庭功能、家庭結構及家庭氣氛三個面向所呈現的樣貌，以提供未來修訂課程或編寫教材時的參考。除了將家庭概念的分成家庭功能、家庭結構、家庭氣氛三個面向，並參考家庭領域的相關書籍，歸納出分析類目，並設計一份「國中補校現

代家庭教科書家庭概念分析表」，作為內容分析時重要的研究工具。其中 1.家庭功能類目分為：生物功能、社會功能、情感功能、教育功能、經濟功能、保護功能、宗教功能、娛樂功能。2.家庭結構類目分為：單身、二代同住、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單親家庭、兩老同住、大家庭。2.家庭氣氛類目分為：(1)個人成長向度包括個人成就導向、智能文化導向、主動休閒導向、倫理宗教導向；(2)關係向度包括凝聚性、表達性、衝突性、獨立性；(3)系統維護向度包括組織性、控制性。經過定量與定質分析後，得出以下結論：1.教科書在家庭功能的部份呈現的特色：最重視家庭中的情感功能；各種家庭功能均有減弱的現象，且被其他社會機構所取代；經濟為家庭生活的基礎，一旦家庭經濟陷入危機，則可能對其他家庭功能亦造成巨大影響；全書中未出現家庭的宗教功能。

2.教科書在家庭結構的部份呈現的特色：核心家庭為現代家庭的主要家庭結構，同時同住的年老父母，不再擁有傳統的絕對權威；雙薪家庭為一社會普遍現象，然而家人的照顧、孩子的管教在書中仍然全部屬於母親的責任；書中未呈現單親家庭、繼親家庭等現代社會中的新型態家庭結構。3.教科書在家庭氣氛的部份呈現下列的特色：鼓勵和諧、凝聚力強的家庭氣氛，同時強調用「經營」的態度來處理家庭的各種關係，重視家庭成員的溝通與交流，以民主理性的態度來化解家庭中的衝突。

參、後殖民議題的相關研究

本節將針對由後殖民概念或由後殖民概念中的文化霸權概念作為研究分析的基礎，對傳播訊息進行研究分析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分析的工作，以有助於本研究從後殖民觀點進行分析與探討成人基本

教育教材的問題上。

陳偉智(1997)主要研究在台灣史的脈絡中關於人的近代性知識的形成問題，特別是集中在「族群」分類知識的討論上。其研究上是透過重讀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作品，分析在殖民情境中田野工作具體的展開過程。分析的內容包括分析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理蕃行政形成的「蕃情」知識、對伊能的人類學知識業績進行了考古學與系譜學式的分析，最後指出日治初期台灣原住民研究的成立過程中，所涉及的殖民地統治、學術研究的文化政治、以及論述形構中知識與權力的配置。

在對伊能的殖民地人類學作品進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之後，研究中進一步地發現伊能理論政治性的內涵。所謂政治性是意指當時伊能的理論當中，存在著合理化殖民與被殖民的不對等關係，以及殖民主義的正當化論述。研究結果顯示，從這些角度來看，伊能的理論似乎是一種人類學形式的殖民論述(colonial discourse)。

林玟漣(2000)以四本原住民教育專書作為研究對象，透過論述分析的研究方法，揭露作為社會製成品的原住民教育論述其所隱含的社會意涵，其研究的目的是瞭解為何原住民教育論述在 1990 年代中後期大量出現？其產生的社會條件為何？其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教育論述有兩種脈絡：「偏遠地區」論述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前者是將原住民置於都市的標準下來評量，所實施的教育目標就是達到與平地一般的水準；而後者著重文化差異，批判同化意識形態對原住民文化造成的傷害。在 1990 年代中後期的原住民教育論述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為主流。而這個現象和台灣國族建構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因為原住民教育論述中的多元文化觀是「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其強調的多樣性只是同化意識形態的掩飾，而這種論述也恰巧為台灣國族建構提供意識形態基礎。

吳宗仁(2001)的所進行的研究中，透過演繹法、結構主義、解釋學和符號論的方法論，對資本主義運作下所產生的現代性產物——電影(cinema)進行總體性研究，將電影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後殖民時代和全球化總過程之中，概括指出當代電影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在此基礎上，針對電影語言及電影本身所涉及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重點性的分析，如分析當代電影的語言符號結構及其特殊運作機制、研究當代電影的語言符號運作邏輯的特徵，並藉此深入分析電影語言符號運作中其與電影生產製作具體過程的各種特殊條件的複雜關係，由此對電影語言符號與日常生活語言符號進行比較性研究，試圖一方面探索電影語言符號同普通語言之間的宏觀共同結構，另一方面又注重於分析電影語言符號同電影製作環境諸因素之間的特殊複雜關係。最後拓展研究焦點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何透過全球化過程，利用文化手段對全世界進行控制的不合理現象。

其研究的結論認為在後殖民的語境中，所有人都沒有辦法脫離西方國家所建構的語言體系，脫離不了語言，自然就脫離不了西方國家對於思想有形或無形的控制。因此，關於整個世界都瀰漫在後殖民氣氛中的這個問題，由於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效的完全徹底的對以西方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所發展出來的不合理體系做出反抗，因此，對於後殖民的討論必須隨時採取一種開放的立場。也就是說，作為後殖民論者必須一方面抵抗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侵略，一方面則必須回過頭來重新關懷各個區域自身存在的價值。後殖民不只是一種完全的對立，而是在對抗當中重新反省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異質性和歷史性。總而言之，關於後殖民的討論必須重申其開放的反省立場，這種思考方向才有助於對當代社會的複雜脈絡開拓清晰的思路。

透過這些為既定的傳播媒介所進行的研究，可以發現到，以後殖

民相關的概念進行分析傳播媒介的工作時，研究方法應以文本分析、論述分析或者使用能夠更適合社會事實的方法論，以達到揭露出文本所隱含的社會意涵的目標。

綜合對成人教育教科書的分析研究以及從後殖民相關的概念對傳播媒介進行的分析研究中，對於本研究擬要進行研究成人基本教育教材是否隱含後殖民的意涵的問題上，可以發現，若單純使用具有量化性質的內容分析法作為研究的方法，是有可能犯了化約(reduction)的錯誤。在閱讀相關研究方法、方法論的文獻之後，本研究擬採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以及後結構主義方法論作為本研究進行的研究方法。